

太平天国早期萧朝贵与杨秀清关系考辨

刘 晨

(北京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871)

摘要:“天兄”代言人萧朝贵与“天父”代言人杨秀清之间并非纯粹的同盟、挚友,两人在合作共事的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矛盾。在太平天国的孕育期,“天兄”曾通过揽权、培植私党、代理首辅,试图创造超越“天父”权威的神话。在金田团营的关键时刻,萧朝贵还利用直接命令、诋毁中伤、孤立压制等手段欲使病重的杨秀清脱离上帝会的权力核心,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天兄”(萧朝贵)与“天父”(杨秀清)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手、仇敌,两者微妙的政治、宗教关系以及太平天国生存的主客观环境,都决定了萧朝贵的“夺权”仅是一股无法逾越地表的政治暗潮。

关键词:萧朝贵;杨秀清;天兄;天父;太平天国

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5)03-0135-08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Xiao Chao - gui and Yang Xiu - qing in the Early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LIU Ch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Xiao Chao - gui and Yang Xiu - qing, who are respectively regard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Heavenly Brother” and “Heavenly Father”, are not sheer alliance or intimate friends. Instead, they have been in great disagreement and conflict known to quite few people. In the initial stage to establish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Xiao Chao - gui tried to challenge “Heavenly Father” by asserting authority, promoting his followers and acting as the prime minister. In the critical moment of Jin Tian Tuan Ying, in order to get Yang Xiu - qing away from the core power, Xiao Chao - gui tried every way, such as giving direct order, spreading slanderous rumors, isolating and suppressing him, so that he could get a chance to realize his political ambitions. However, they are far more than opponents or enemies to each other. The delicate relationship both politically and religiously, as well as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nvironment made it an insurmountable political undercurrent.

Key words: Xiao Chao - gui; Yang Xiu - qing; Heavenly Brother; Heavenly Father;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关于太平天国起义前后的组织架构、权力消长,学界多有研究^①,但是,对太平天国“神权”(实为世俗权力)之“天父”(杨秀清)与“天兄”(萧朝贵)的关系,尚无专题研究。本文以此为着眼点,展开初步探讨。

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一月,上帝会创始人冯云山被紫荆山士绅王作新捕拿,上帝会陷于危机。次年三月,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传言,安抚会众。九月,萧朝贵学步于杨秀清,迎天兄耶稣来到人间。从此,原本声名不著的萧朝贵,脱颖而出,一跃成为上帝会的核心领导之一。

萧朝贵凭借“天兄”的神奇力量 and 个人的谋略智慧,一步步逼近最高权力核心,并与洪秀全、杨秀清等共同完成了金田起义前后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的宗教、政治权力

格局的构建,而萧朝贵、杨秀清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权力网络中尤为重要。

^①参见王庆成《〈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和太平天国历史》,《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饶任坤《试论杨、肖怎样夺取金田起义领导权》,《广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苏双碧《〈天兄圣旨〉——洪、萧互相利用的产物》,《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茅家琦《〈天兄下凡圣旨〉和太平天国早期历史的若干问题》,《太平天国史研究》第2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39页;梁义群《拜上帝会领导核心形成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等等。

一、合作

长期以来,萧朝贵被认定为杨秀清最亲密的伙伴、最忠实的战友,这主要是缘于二人在太平天国政治博弈和权力角逐的舞台上配合得天衣无缝。

但他们也有意见不一的时候。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二月初七日,王玉绣、王盛通、王为政到鹏隘山请求洪秀全早登王位,天兄下凡传言“尔们今晚求天父上主皇上帝,总要求天父上主皇上帝准洪秀全早坐金龙殿。朕看尔们那个会求也。”^①萧朝贵对洪秀全是否登位的态度比较暧昧,一方面表示同意洪秀全“早坐金龙殿”,一方面又要三人转求天父意见。《天父圣旨》卷一、卷二无存,我们无法直接得知王玉绣等三人转求天父的结果,但从《天兄圣旨》看,直至己酉年底、庚戌年初(1850年初)洪秀全方得秘密穿起黄袍称“太平王”^②,在此之前天兄再未下达关于洪秀全称王登基的指示,可见这个问题可能由于天父的反对而被搁置。萧朝贵模棱两可的表态,既不开罪洪秀全,又尊重杨秀清的意见,把容易招惹麻烦的决定权转移给杨秀清,这是他在政治舞台上日趋成熟的表现。

后来萧朝贵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与杨秀清趋于一致。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二十三日,天兄下凡嘱咐洪秀全“秀全,尔穿起黄袍么?……要避吉,不可命外小看见,根机不可被人识透也。”萧朝贵多次要求洪秀全“避吉”,要求会众“谨口”^③。萧的态度由起始支持洪秀全早登王位,转变为劝洪秀全和会众不可操之过急。

萧朝贵与杨秀清的合作关系是以双方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一方面,上帝会内部派系林立,有人利用其他神灵传言立威,反对天父、天兄教训,杨秀清、萧朝贵必须打败他们,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是天父、天兄、杨秀清、萧朝贵之间达成的默契;另一方面,杨秀清、萧朝贵策划成为天父、天兄的代言人,表现出极其强烈的权力欲,他们只有合作,才能冲破洪秀全、冯云山确立的权力格局的束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他们联合实施了两大阴谋:一是击败会内主要反对派,打击赐谷王家和天冲曾家;二是排挤、超越冯云山。

贵县赐谷村王盛均、王为正父子是洪秀全的表亲,是拜上帝的最早信徒,其资历高于杨、萧。后来,在杨、萧联合打击之下,赐谷王家一蹶不振^④。天冲曾家的势力也比较大,资历较老,曾玉珍、曾云正、曾观澜、曾玉璟等都是拜上帝的积极分子。曾家在杨、萧的排挤下逐渐淡出,有的根本没有参加金田起义,有的随军至江口圩折回^⑤。至于冯云山,则被萧朝贵用“天话”指示,由原来的第二位降为第四位^⑥。

上帝会和太平天国内部一直存在的这些所谓“异

己”势力,反过来促成杨、萧联盟在客观上具有长久性。直到金田团营时期,仍然存在会众降托妖魔乱讲的事情^⑦。而王家、曾家的残余势力和冯云山的影响力也一直存在,杨、萧不能不有所警惕。

二、分歧与矛盾

(一) 分歧

萧朝贵和杨秀清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

萧朝贵对文化人和读书人有轻蔑和排斥的一面。天兄曾下凡指示洪秀全“孔丘被天父发令捆绑鞭打……他从前下凡教导人之书,虽亦有合真道,但差错甚多。到太平时,一概要焚烧矣。”^⑧洪秀全由于个人坎坷的读书经历,对孔子和儒学也不抱好感。二人合作的《太平天日》还丰富夸大了批判孔子的情节“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⑨在这类既有偏见的指引下,太平天国早期的文化政策偏激而荒诞。

同样是出身贫苦,识字无多的杨秀清可能对此早有异议,他或是考虑到天兄与天王在这一政策上的共识,或是考虑到与萧朝贵的关系,迟迟没有发难。定都天京后,杨秀清正式借天父之口下令“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⑩

杨秀清尊重文化和读书人的态度要比萧朝贵和洪秀

^{①⑥⑧⑩}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5、7、103页。

^②《天兄圣旨》己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50年2月10日),韦正奏明天兄“现大军既毁破周凤鸣巢穴,他畏惧遁去,大军现宜回朝朝见太平王也”。可见此时洪秀全已有“朝”并称“太平王”。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1850年4月5日),天兄爱降圣诏谕天王曰“秀全,尔穿起黄袍么?”天王对曰“然也。”可知洪秀全在此前不久秘密黄袍加身(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31、40页)。综上,洪秀全约在1850年初登基称王。

^③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36、40、43、45页。

^④参见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13—14、15、20—21、56、64、73—74页。

^⑤简又文《金田之游及其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4—25页。

^⑦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63、67、70页。

^⑨《太平天日》,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636页。

全高明得多。洪秀全在天父和杨秀清的压力下,被迫成立删书衙,令卢贤拔、曾钊扬、何震川等删改《六经》^①,前之太平天国对文化扫地荡尽的政策终于宣告结束。

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错综复杂,萧朝贵和杨秀清对天地会的态度即大不相同。从萧朝贵率军北攻长沙,沿途不断吸收天地会众加入的实际行动看,他对天地会的争取是积极的。

杨秀清对天地会则一直存有偏见。咸丰元年(1851)底,杨秀清于永安颁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檄》,其中有“况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协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仇敌者也”之语^②,公开批判天地会。杨秀清时代,太平天国始终未能密切配合、支援天地会在各地的反清活动,太平天国与天地会之间缺乏有效的关系纽带。

陈来案是杨、萧关于天地会问题分歧的集中体现,也是杨、萧关系紧张的表现。

因罗大纲前去联络天地会,把病重的妻子托付给陈来(杨秀清岳父)^③照看,结果罗妻病故,陈来“私自捡起他金戒指一只、银牙签一副”,被人告密至萧朝贵处。萧朝贵于咸丰元年三月十八日假天兄下凡,传讯陈来。陈来隐瞒不报,拒不认罪。萧朝贵暂不明示,而是使用疲劳战术,一日之内五次下凡接连审讯,迫使陈来认罪。最后天兄“叫人煲糯米饭畀陈来食,食饱好落地狱也”。

萧朝贵把原本微不足道的事情扩大化,目的在于杀一儆百。“天兄”下凡训斥陈来说“当日罗大纲是何人叫他去的?尔咁大胆,尔敢看他小。尔看他小,是看他何人也?尔把天父天兄降托秀清、朝贵是假的么?”罗大纲系天地会中留在太平天国为数不多的首领之一,又为天国屡立功勋,杨秀清却对他多有猜忌。萧朝贵则通过天兄告诫众人不要轻视罗大纲,意在笼络,也可看出萧朝贵对天地会的支持、安抚态度。

后来陈来之子陈得桂到天兄面前求情,“天兄”说:“尔求得天父下凡,托秀清口出讲准赦,朕就准也。”萧朝贵把陈来的生死大权转交杨秀清,实际欲使杨陷入两难之地。《天父圣旨》卷一、卷二无存,我们无从得知天父的处理结果,但从天兄最后宣布的“照朕高兄主意,尔父亲十死无一生”这句话,杨秀清很难违背天兄旨意,陈来似难活命^④。

可以想象,杨秀清亲自下令处死岳父时的痛苦。罗大纲后来虽一路攻城拔寨,战功显赫,但直到咸丰五年(1855)在芜湖阵亡前仍然只是冬官正丞相,始终未获擢升,而功劳相近的秦日纲、胡以晃此时却已封王。究其原因,除他“非粤西老贼”^⑤外,与因陈来之案开罪杨秀清而靠山萧朝贵过早战死不无关系。

萧朝贵借天兄之口一日之内五次下凡处置陈来,软

硬兼施,甚至“吊各军军长、百长、营长各带齐各营内兵将到来”^⑥,为自己树威;另外,萧朝贵安抚、笼络罗大纲,为自己培植势力,同时打击了杨秀清及其势力,可谓一石三鸟。

(二)“杀父夺妻”

亲历过太平天国的文人谢介鹤曾记载:

先是永安分男女禁,除天贼及东、西、南、北、翼贼外,凡男女私,虽夫妇必斩,而西贼父在长沙途中,与西贼母合,贼众觉语西贼,西贼与东贼遂同议斩其父母以警众。西贼转谓人曰:父母苟合是犯天条,不遵天令者,不足为父母也^⑦。

这则资料反映了太平天国早期严别男女情形。但有两处错误被人们忽视。首先,太平天国严别男女并非始自永安时期。早在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天兄就在紫荆山下令“男有男行,女有女行。”^⑧所以,在金田团营之前,上帝会就实行男女之禁,到永安只是更加严格。据调查“太平军在永安州,男女之禁很严。做礼拜时,男同男坐,女同女坐,听讲道理,从无混杂。”^⑨洪秀全在永安还颁布了《严命犯第七天条杀不赦诏》^⑩。

①⑤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三),第327、61页。

②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7—108页。按,《太平天国印书》所录据《颁行诏书》初刻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和《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也收录了这篇檄文,但系据《颁行诏书》修改本,其中无“三合会”的内容。又,这份檄文虽是杨秀清与萧朝贵联名署衔,但实际是杨秀清授意文书人员而作,萧朝贵仅署名而已。在另一篇杨、萧联名颁布的重要檄文《救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中,有“上帝是本军师亲爷,亦是尔等亲爷”的话,这显然是站在杨秀清的立场上写的,杨秀清是上帝第四子,萧朝贵仅是“帝婿”,而非上帝亲子。

③张晓秋《粤匪纪略》记“陈得龙、陈得桂俱杨逆舅子。”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续编》)(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据《天兄圣旨》,陈得桂系陈来之子,故陈来系杨秀清岳父。

④以上天兄下凡处理陈来案的记录,见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83—89页。

⑥⑧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87、28页。

⑦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四),第668页。

⑨饶任坤、陈仁华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页。

⑩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页。

其次,由郴州进军长沙途中,萧朝贵与洪秀全、杨秀清始终分兵,未曾谋面,直至萧朝贵战死,洪、杨始率大军自郴州北上^①。所以,在进军长沙途中必不存在西王与东王共议杀父之事。

但据上述分析,仍然不足以完全否定这则资料的真实性。从现有史料看,朝贵生父蒋万兴,养父萧玉胜,蒋万兴在庚申十年(1860)尚健在,萧玉胜则下落不明^②。那被处死的“西贼父”只可能是萧玉胜。据咸丰三年(1853)九月初九日广西巡抚劳崇光奏称“又据查明韦正之父韦元玠、萧潮溃之父萧木春,继母萧魏氏,均尚现在,同往贼巢。”^③因此存在如下可能:萧朝贵养父萧玉胜(或即萧木春)及其续娶之妻萧魏氏在进军途中因犯天条被处死。

《天兄圣旨》确曾记录萧朝贵与其父、兄关系不睦。天兄下凡伊始,即为处理“萧朝隆有罪当责”之事,险些打萧朝隆板子。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二月十八日,萧朝贵又以天兄的口气责怪萧玉胜说“为父母要平心”,“切不可轻南重北也”^④。萧朝贵确实对养父偏爱兄弟的行为心存不满,但这种不满还不至杀死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父亲,而且萧朝贵可以以“天兄”的名义行事而不必自己承担无情不孝的骂名。

另外,如果有人发现西王父母犯天条,是否有胆量告发尚需考虑,即便有胆量,则可直接告知东王,无须由西王转告;即便告知西王,萧朝贵若真对其养父痛恨到非杀不可的地步,也无须再同杨秀清商议,他对犯第七天条的会众有直接处理的权力^⑤。又据流传于湖南郴州一代的民间传说“萧朝贵挥泪杀父母”,记录了杨秀清以“天条大还是肉亲大”的话胁迫萧朝贵杀父的事情^⑥。所以,如果确有西王父因犯天条被处死之事,事情的经过可能是有人向杨秀清告发,杨秀清转问萧朝贵如何处理,并将生杀大权交给萧朝贵,萧朝贵迫于杨秀清压力,只得回答“不遵天令者,不足为父母也”。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的记载证实了这一点“伪西王萧朝贵之父,在长沙途中,密招朝贵母同卧。众觉,白杨秀清转达洪秀全,欲曲原之,而朝贵竟斩其父母以警众,且扬扬语人曰:父母违犯天条,不足为父母也。”^⑦谢介鹤又在《金陵癸甲纪事略》“粤逆名目略”中自相矛盾地叙述道:“(杨秀清)又杀西贼父,北贼兄,及东贼兄杨元清妻,以示威。”^⑧这或是事情的真相。杨秀清处置此事的方法与萧朝贵处死陈来的方法异曲同工。

在《金陵癸甲纪事略》中,还有一条关于杨秀清与萧朝贵之妻“洪宣娇”私通的记载,朝贵对此事“诮让备至”^⑨。笔者曾有专文论述^⑩。

如果谢介鹤所记两则资料属实,那杨秀清与萧朝贵便有“杀父夺妻”之仇,两者矛盾很有可能激化。

三、超越杨秀清的尝试

对于权力的追求,促使萧朝贵联合天父代言人杨秀清,神化自身,超越冯云山。在权力面前,萧朝贵暴露出更多的私欲。我们发现,萧朝贵并没有把杨秀清当作纯粹的挚友、同盟,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位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才是萧朝贵鲜为人知的内心写照。

(一) 大肆揽权

起义酝酿阶段,在洪秀全的配合下,天兄未经天父过问,就直接决定了许多重大问题。洪秀全曾主动向天兄请示起义后的军师人选问题,天兄回答道“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俱是军师也。”不久,天兄又传谕洪秀全:“但尔称王,不得称帝,天父才是帝也。”^⑪这时距金田起义扯旗建号尚有两年多的时间,天兄这一句话便决定了后来建立的太平天国没有皇帝之设。通过天兄和洪秀全的这些对话,我们发现,天兄处理的这些事情都是新问题,天父没有首先发表意见,但这些问题原本是应由太平天国最高神——天父决定的。天兄代言人萧朝贵的揽权显然影响了天父代言人杨秀清的权威。

长期以来,学界忽视了萧朝贵多重代言人的身份,除代天兄下凡传言外,他还获得了代天母传言的神圣权力。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天母”突然下凡传言“众

^①参见《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为西王有难禀东王等》,《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华强《太平天国北伐的两个问题研究》,《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

^②参见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三),第75、85—86、104页。

^③《广西巡抚劳崇光奏复遵旨发掘杨秀清、韦正等祖坟情形折》(咸丰三年九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0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④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3—4、28页。

^⑤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21页。

^⑥陈棣生主编《虎啸龙吟——太平天国民间故事集成》,岭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52—53页。

^⑦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6页。

^⑧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四),第668页。

^⑨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四),第707页。

^⑩参见刘晨《再探“洪宣娇”》,《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

^⑪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5、10页。

小,头一要听尔天父教导,第二要听尔哥教导。总要坚耐遵正,切不可反草也。”^①天母下凡传言在整个《天父天兄圣旨》中仅有一次,但就是这唯一的一次,天母神圣的光环已笼罩在萧朝贵身上。多重代言人的身份也的确增加了萧朝贵排挤杨秀清权力的砝码。

萧朝贵在金田起义前后权力的膨胀与他个人的付出是成正比的。金田起义前夕,萧朝贵是金田团营和上帝会的真正领导者,从科炭救护王为正、吉能胜,安抚、鼓励、奖惩会众,频繁接见各基地首领,到指挥各地团营事宜,甚至远至广东信宜凌十八部都受其指挥。萧朝贵还亲自往返于广西各地,不辞劳苦,甚至有时一日之内代天兄下凡数次,指示会内事务。萧朝贵本人也因连日奔波、劳累过度而患上疮毒^②。

(二) 培植私党

金田起义在韦昌辉家乡发动并非偶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萧朝贵拉拢韦昌辉的结果。

首先,韦昌辉是萧朝贵亲手提拔并培养起来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八月初六日,天兄下凡,令萧朝贵和韦昌辉前往贵县去迎接洪秀全、冯云山到金田。当时杨秀清也在场,他认为,“小弟不去接三星兄,理有未顺,抑恐三星兄怪小弟也。”天兄却当即拒绝了杨秀清的提议,命令道“秀清弟,尔且回家,但韦正、朝贵二人尚贵县可也。”萧朝贵为什么要拒绝杨秀清同往贵县迎接洪秀全呢?《天兄圣旨》给出了答案。萧、韦见到洪秀全后,“天兄谕韦正曰‘韦正,尔呼朝贵为何?’韦正时却未知何样称呼,语言迟出。天王问天兄基督曰‘天兄,韦正在高天与小弟们是同胞否?’天兄曰‘他同朕们总是共条肠也。’”^③

原来萧朝贵不允杨秀清同行的原因,是要越过天父和杨秀清,单独确立韦昌辉在上帝会的领导地位和上帝小家庭中的“同胞”关系。至此,韦昌辉正式步入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的领导行列,成为萧朝贵的嫡系。

此后,萧朝贵还把上帝会大本营设在金田,多次安排韦昌辉处理重要事务。韦昌辉也是顺从萧朝贵的。在《天兄圣旨》中,韦昌辉的出场总是与萧朝贵在一起,凡遇重大事务,他也总是站在萧朝贵的立场上。上帝会众打败周凤鸣的地方团练后,萧朝贵欲令大军班师,石达开、王玉绣坚决反对,出言顶撞天兄。天兄询问韦昌辉,韦回答“小弟总是听天兄吩咐”,“现大军既毁破周凤鸣巢穴,他畏惧遁去,大军现宜回朝朝见太平王也。”^④韦昌辉与石达开对“天兄”的态度对比鲜明,这也是萧朝贵大力提拔韦昌辉而冷落石达开的一个原因^⑤。此外,在天兄下凡时,韦昌辉还多次替萧朝贵充当打手,责罚会众,博取萧朝贵欢心^⑥。当然,在当时残酷的军事、政治斗争环境下,仅靠阿谀奉承是很难服众的,韦昌辉也确实不负

众望,在金田团营中表现突出,为金田起义的成功发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必须注意的是,韦昌辉与萧朝贵曾经存在的同盟关系,或也是后来杨秀清打压韦昌辉的原因之一。

萧朝贵还利用“超升灵魂”的宗教手段培植个人势力。这些被萧朝贵超升灵魂的信徒,自然要对他感恩戴德。据《天兄圣旨》记载,“天兄”非常频繁地给会众们超升灵魂,其中包括秦日纲、陈玉书、蒙得恩等重要人物,“天兄”甚至一次就给23位重要人物超升。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二十七日,“天兄”教导谭添顺、蒙得恩、蒙时雍三人说“太平事是定,但要谨口,根机不可被人识透也。”次日,“天兄”为三人超升灵魂^⑦。对于这次觐见天兄并超升灵魂事,12年后,蒙时雍仍记忆犹新,他在家书中写道“自庚戌年二月敬天父上帝天兄耶稣,为日无几,即随先父到平在山面觐真圣主天王天颜,仰蒙面诏教导,指引甚属精详。侄与先父从此格外信实认真,去邪崇正。其时‘天兄’令甚严肃,不准轻泄机关,故此不敢轻与人言。”^⑧可见当时萧朝贵培养宗教感情的手段给蒙时雍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除了重视核心力量的培养,萧朝贵还非常关注基层

^{①③④}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27、16—17、31页。

^②据《天兄圣旨》庚戌年八月初一日记载,天王禀奏天兄“朝贵妹夫现有疮毒,他为天父天兄事,不辞劳苦也。”八月初八日记载,韦昌辉禀奏天兄“妹夫脚疮还有些痛。”天兄说“尔妹夫脚好,就好起程。”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65—66、69—70页。

^⑤在《天兄圣旨》的记载中,石达开自此几乎再未发表意见,甚至很少出场。石达开本人在起事后的较长时间内也不为人们关注,直到咸丰二年(1852)十月他的名字才开始出现在清廷征剿大吏的奏报中。徐广缙向咸丰帝奏称“有坐轿贼目被兵勇长矛戳毙,割取首级,认明实系伪翼王石大割。”《钦差大臣徐广缙奏报敌由西路窜逸官兵截击获胜并派兵赶紧追剿折》(咸丰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4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也正是在萧朝贵殒命长沙后,石达开的军事才华方得崭露。又按太平天国以“左为上”,如杨秀清的“左辅”要高于萧朝贵的“右弼”;初封五军主将时,石达开的“左军主将”级别应高于韦昌辉的“右军主将”,只是在后来的进军途中发生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政治变动。石之地位落后于韦,或与萧朝贵的压制有关。

^⑥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71、73页。

^⑦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80—81、43、45页。

^⑧《蒙时雍家书》,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二),第754—755页。

队伍的教育工作,前述“超升灵魂”之事也涉及基层群众。天兄曾“叫传各营兄弟到前,逐营超升,逐营教导”,“一直超升、教导至夜而后止。天兄嘱咐各小弟,回衙食夜饭先”^①。“超升”之事似未中止,仍待继续。

萧朝贵甚至事无巨细,直接任免基层官员:

天兄问玲进曰“玲进,尔带有几多兵将?”玲进奏曰“有五百名。”天兄又问玲进曰“那人封尔作先锋长?”玲进奏曰“天兄封小子的。”

天兄叫传各营兄弟到前……惟传到前军管下营长赖西成到前,因他应对不来,天兄发令“杖一百,革去营长。”^②

可见,仅管五百个圣兵的先锋长也是由萧朝贵直接任命,这些人自然对他惟命是从。

(三) 代理首辅

据《天情道理书》记载“迨庚戌四月间,东王一旦忽又口哑耳聋,耳孔出浓(脓),眼内流水,苦楚殆甚;一则因代弟妹赎病之劳,二则乃天父默中使成,以试我们兄弟姊妹心肠,真否认实天父天兄真道也。……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国军务,乃食天下弟妹。”^③长期以来,学界据此认为,杨秀清在金田团营的关键时刻诈病树威,居于幕后指挥,由萧朝贵发号施令,统筹全局。

萧朝贵在这段时期表现确为活跃,可以说是真正执掌上帝会权柄者,然而杨秀清诈病则未必是真,《天情道理书》所记也不尽属实。

首先,杨秀清选择庚戌(道光三十年,1850)四月诈病不合时宜。当时,上帝会所面临的紧张形势不容忽视。大黄江巡检黄基率兵搜捕陈亚贵,途经鹏隘山时勒索乡民未遂,扬言道,“奴辈拜上帝会谋不轨,行将屠之”,会众130余人在金田韦昌辉家集众自卫,官府勒令解散。接着,“陈玉书举家回上湾,道新墟为巡检勇截留其妾”,会众“愤而复聚”,上帝会与地方官府的冲突一触即发^④。广东信宜的局势更为严重,凌十八在大寮劝人敬拜上帝,有会众数百人,引起了地方官府的注意。四月,信宜知县宫步宵下令“飭查凌十八等,并谕悔悟免究”;附近士绅也联名具禀,要求官府出兵镇压^⑤。在这种紧张局势下,主持全局的萧朝贵并未采取任何明智果断的措施,而是要求会众耐心等待,“待妖对妖相杀尽意,然后天父及天兄自然有圣旨分发做事也。”^⑥接下来上帝会和地方武装的矛盾日益加剧,斗争不断升级,是年六七月份上帝会发布团营令,会内事务十分繁忙,急需统一的领导核心,而萧朝贵在此前的三月至六月上旬保持沉默^⑦。如此残酷紧张的斗争形势是不允许杨秀清蓄意选择在四月份诈病的。

其次,《天情道理书》关于杨秀清患病时间的记载是值得怀疑的。按照《天情道理书》的说法,杨秀清在庚戌年四月至十月初一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几成病废。但是,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天兄在金田下凡传令“秀全,今天使蒙得恩回洪化山,直路到胡以晃家,唤胡以晃到来也。又使一人到平在山,唤秀清到来也。”杨秀清此时还能到金田开会,说明他尚能行动,并非病重不能起身。八月初一日,天兄复下凡,对洪秀全说“妖魔又作怪,要差秀清、朝贵二人战妖也。”^⑧接着萧朝贵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妖魔之戏。遵照天兄之命,杨秀清也应随即表演。可见,四月至八月初一日,杨秀清还没有病重到失去行动能力,甚至还可以“战妖”。是故,《天情道理书》为宣扬天父神威,刻意神化杨秀清,夸大了杨秀清病情延续的时间。

第三,杨秀清病重有人证。八月二十日,赖培英、张维昆等奉洪秀全之命前往鹏隘山看望杨秀清后,向天兄禀奏“秀清兄今年身体十分苦楚”,“求天兄化醒清兄,心内灵通,使他能知识,闻小弟们说话也。”^⑨这段话表明赖培英等人已探望过杨秀清,杨秀清此时“十分苦楚”,而且并不清醒,确实病得不轻。

结合以上论述,杨秀清病情加重当在八月。根据《天兄圣旨》,整个庚戌年,天兄在八月份下凡的次数是最多的(见下页表1),也可佐证杨秀清在八月病情加重,权力已经集中到萧朝贵手中。

杨秀清患病的时间,《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在会中,彼(杨秀清)忽生哑病,两月内不能言语。”^⑩洪仁玕在自述中也说“东王能代人赎病,至耳聋流水,口疮流涎,二月余之久。”^⑪二者都记杨秀清生病的时间是两个

①⑥⑨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88、45—46、74页。

②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82、88页。

③《天情道理书》,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第366—367页。

④民国《桂平县志》卷33《纪事》下编,第12—13页。

⑤光绪《信宜县志》卷8《纪述三·兵事》,第4页。

⑦杨秀清和萧朝贵同为上帝会的实际领导人,两人不会同时放下领导工作。据《天兄圣旨》,庚戌年三月初四至六月十九日,其间天兄仅于四月二十二日下凡一次,天兄的沉默可能与上文所述“疮毒”有关。

⑧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57—58、66页。

⑩[瑞典]韩山文著、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866页。

⑪《干王洪仁玕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二),第409—410页。

表1 庚戌年(道光三十年,1850)天兄下凡次数的统计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8	5	1	1	0	5	10	16	3	0	1	0

月。另据《天情道理书》,杨秀清完全康复是在十月^①。因此,杨秀清真正患病的时间是八月和九月^②。另外,八、九月份正值金田团营、起事立国的关键时刻,杨秀清此时诈病不但不能树威,反而有可能弄巧成拙,丧失权力。所以,学界长期持有的“杨秀清诈病树威,杨秀清、萧朝贵联合掌权”的论断值得商榷。

杨秀清病重期间,萧朝贵开始代理“首辅”之职,执掌上帝会的教务、教权,这也是他超越杨秀清的一次大好时机,萧、杨争斗的暗流随之涌现。

萧朝贵主政期间,为打击、控制杨秀清采取了三种手段:

一是直接命令。道光三十年(1850)八月初一日,萧朝贵在平南鹏化山约杨秀清战妖完毕,不以“天兄”之命而是自己直接对其下令:“四哥,尔先回去。小弟现停几日,制服这处妖魔先,然后归也。”^③杨秀清奉天兄之命由鹏隘山至鹏化山战妖,然后又奉萧朝贵之命先行返回,可见萧朝贵已经能够直接指挥杨秀清的行动。

二是诋毁中伤。杨秀清病重期间,上帝会内“未识皇上帝之圣心,皆私议东王几成病废,以致有不知尊敬东王,反为亵渎东王”^④。杨秀清声名大损。在当时“天兄”病重、洪秀全和冯云山“避吉”的情况下,这种舆论导向最有可能是萧朝贵所为,而这种舆论也只有“天兄”默许下才有存在的空间。

三是孤立压制。八月二十日,杨秀清病重期间,韦昌辉奉洪秀全之命欲接杨去花洲养病,天兄立即拒绝,接着“韦正又求天兄差清兄去金田安福,又求入蓝厂安福”,萧朝贵总以“不去得”、“总不去得”、“总不妨”等话拒不放人^⑤。很明显,萧朝贵拒绝杨秀清脱离自己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孤立和控制杨秀清,杜绝杨秀清与洪秀全、冯云山及地方实力派联合,同时确保金田作为上帝会大本营和指挥中枢的地位。韦昌辉却未谙其意,在此问题上未能与萧朝贵配合默契。

萧朝贵在拒绝放人后,预感到自己的首辅地位并不稳固,而手中的权力或许迟早要交还给还在病中的杨秀清。他代天兄传言给韦昌辉:“朕这今倘或三两月下一回也不定。有事尔同尔妹夫商量理酌,切不可畀人看小尔三星兄江山。朕所吩咐说话,尔切要记紧。”在萧朝贵对韦昌辉的千叮咛万嘱咐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权力的留恋,而他能够倚赖的,主要还是韦昌辉。萧朝贵的预感是对的,杨秀清在一个月后复出,天兄在天兄复出后的三、四个月只好保持缄默^⑥。

杨秀清在金田团营即将完成的重要时刻病愈登场,对他来说,是再立天父权能和自己威严的良机。

杨秀清复出后,“有神附体传言,比别人为多。每次代天上帝传言时,严厉肃穆,责人罪恶,常指个人而宣传其丑行”^⑦,“每有所言即应验”^⑧。杨秀清是要通过天父的频繁出现,消弭萧朝贵执政时期给他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道光三十年十月初一日,金田团营尚未完成。陆川、博白、花洲、信宜等地的大批会众尚在途中。所以天兄在九月二十五日仍然强调“千祈秘密,不可出名先,现不可扯旗,恐好多兄弟不得团圆矣。”^⑨萧朝贵直到九月下旬还是坚持暂不起事的保守态度。十月初一日,杨秀清

^①杨秀清完全康复必然给会众留有很深刻的印象,而且《天情道理书》明确指出“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记录时间精确,并且与金田团营联系起来。结合上述杨秀清八月病情加重的论证,《太平天国起义记》和《洪仁玕自述》关于杨秀清生病两个月的记载,各种史料相互参证,《天情道理书》所记杨秀清于十月完全康复的日期应当无误。

^②结合“庚戌年天兄下凡次数表”与《天兄圣旨》的记载,自庚戌年六月底天兄接见洪秀全家人,开始十分频繁地下凡理事,萧朝贵也开始了自己的首辅生涯。但杨秀清患病是在八月、九月,萧朝贵在六月底就开始主政了,很可能是因为杨秀清此时虽然还没有病倒,但已“寝不安枕,食不甘味,不辞劳瘁,艰苦备尝”(《天情道理书》,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第366页),身体状况不佳,迫使他逐渐退居二线。九月份萧朝贵代天兄下凡的次数虽然骤减,但天兄分别于初十日、十五日、二十五日下凡,前后时间相隔比较均匀,而且天兄仍然继续处理会内重要事务并下令“现不可扯旗”。从这点看,九月份仍是萧朝贵主政期,权力还在萧朝贵手中。

^{③⑤⑨}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66、74、77页。

^④《天情道理书》,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第367页。

^⑥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75页。天兄从庚戌年十月到次年正月月底的近四个月,仅十一月初旬下凡一次。

^⑦[瑞典]韩山文著、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866页。

^⑧《干王洪仁玕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二),第410页。

复出,否定萧朝贵的保守政策,果断采取迎接会众的措施,不惜与清军交火,大张旗鼓地准备起事。十月十八日,杨秀清派队伍至大洋圩迎接前来金田团营的陆川上帝会赖九所部,与清军激战,赖九部顺利从上游渡浔江,抵达金田^①。十一月二十二日,杨秀清又派蒙得恩带人前往花洲,二十四日在思旺圩大败浔州协副将李殿元部,斩杀秦川巡检张镛,迎洪秀全、冯云山返回金田,花洲上帝会众也到达金田,这就是著名的“迎主之战”^②。洪秀全、冯云山在八月份曾有与杨秀清会面的努力,但因萧朝贵的阻拦未能成行。这次三人终于相见,地点不是在花洲而是在萧朝贵的大本营——金田。

四、结语

萧朝贵与杨秀清,起身微末,穷困潦倒。二人有着同样艰辛悲惨的人生经历,都对现实压迫产生不满。他们比邻而居,在鹏隘山种山烧炭,结为挚友,终因不堪欺凌,同拜上帝,毁家纾难,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军民都给予他们极高的评价。也正是由于二人志同道合,精诚合作,金田起义的号角才能顺利吹响,太平军才能从贫瘠荒芜的紫荆山,一路高歌猛进,攻破六朝古都南京。

但是,萧朝贵与杨秀清并非纯粹的同盟、挚友,两人在合作共事的背后,隐藏着矛盾。萧、杨二人也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对手、仇敌,两者微妙的政治、宗教关系以及太平天国生存的主客观环境,都决定了“天兄”排挤“天父”,甚至意图取而代之,仅是太平天国萌芽时期一股涌动的夺权暗潮。所以需要注意的是,萧、杨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萧朝贵与杨秀清并非存在先合作后分歧的时间逻辑关系,而是在合作中夹杂分歧和矛盾,但仍在矛盾中需要和坚持合作,合作是主流,矛盾和超越是暗流。

综合前文与其他史实可见,萧朝贵超越杨秀清尝试的失败,有它的必然性。

萧朝贵之所以能通过宗教手段和平超越冯云山,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他所倚赖的地方实力派,而冯云山所依靠的仅是一帮手中没有实权的小知识分子。杨秀清不同,他既有神的身份,又有自己能够调遣的地方力量,杨秀清能去贵县发号施令的例子说明他的势力并不局限在紫荆山区^③。所以,萧朝贵很难通过和平手段取代杨秀清的权力。但是,对萧朝贵来说,主客观环境又不允许萧、杨之间使用暴力,这就决定了萧朝贵夺权的必然失败。

第一,维护天父权威和杨秀清“天父代言人”的地位,符合洪秀全“天父之子”的利益。萧、杨之间的争斗可以是暗流,可以悄无声息地进行,但洪秀全、冯云山决

不允许暴力夺权的事情存在。

第二,杨、萧之间存在合作的需要。即使萧朝贵暴力夺权成功,也只能是两败俱伤,萧朝贵很有可能被上帝会内其他实力派消灭。这一点,萧朝贵自须正视。

第三,当时上帝会面临的紧张局势决定杨、萧之间必须合作。只有天父、天兄共有的神秘力量,才能顺利点燃金田起义的火种。

萧朝贵与杨秀清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利益的冲突与权力的角逐。这是一股暂时不能超越地表而喷发出来的暗流,被较为成功地限定在合作的表象之下。据《天兄圣旨》,金田起义立国后,天兄与萧朝贵复出,在太平天国的神坛和政坛上又开始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种势头已大不如前。直至咸丰元年(1851)十月二十五日永安封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杨、萧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正式宣告了“天兄”超越“天父”尝试的失败^④。

作者简介:刘晨(1986—),男,山东滨州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方英

①《广西巡抚郑祖琛等奏报前任云南提督张必禄病故及剿办桂平等处会众折》(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104页。

②《署理广西巡抚劳崇光等奏报督带兵壮团练剿办桂平、金田会众及副将伊克坦布等阵亡折》(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117—119页。

③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十六日,杨秀清至贵县代天父传言“高老山山令遵正,十字有一笔祈祈。”《天命诏旨书》,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第59页。意思即“天父出令,千祈遵守”。

④后来,萧朝贵战死长沙颇有蹊跷。有野史记载:“时清守军援军众溢太平军数倍,朝贵知不能得志,疏请大营趋长沙。天王欲拔队,秀清曰‘西王刚愎,不稍挫之,后不听命,俟其自归可也。’天王曰‘设有不测奈何?’秀清曰‘西王勇悍,纵有小挫,清妖不敢逼,必能自脱。’”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第317—318页。如果这段材料属实,萧朝贵的死就不单纯是个意外了。它反映出杨秀清、萧朝贵之间存在矛盾。基于此,或有杨挟嫌报复的可能。